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ERIODICALS

中国期刊史



第二卷 (1911—1949)

石 峰 主编 吴永贵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ERIODICALS

中国期刊史

中国
期刊
史

第二卷 (1911—1949)

石 峰 主编 吴永贵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王 萍

封面设计：王红怀 赵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期刊史．第二卷，1911—1949 / 石峰 主编；吴永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 - 7 - 01 - 017243 - 9

I. ①中… II. ①石… ②吴… III. ①期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11 - 1949 IV. ①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9609 号

中国期刊史 第二卷（1911—1949）

ZHONGGUO QIKANSHI

石 峰 主编 吴永贵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4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243 - 9 定价：8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顾 问：张伯海

主 编：石 峰

撰 稿 人：刘兰肖 吴永贵 范继忠 李 频 段艳文 钱俊龙

编委会主任：石 峰

编委会副主任：余昌祥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 峰 刘兰肖 刘建生 孙 琇 李 频 肖 宏 吴永贵 余昌祥

张友元 张伯海 范继忠 侯正新 段艳文 姜长喜 钱俊龙 章新民

编委会办公室：刘晓玲 章 红

特 约 审 稿：张伯海 刘建生 章新民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节	民国期刊的社会性	001
第二节	民国期刊的时代流变	006
第三节	民国期刊的类型结构	011
第一章	民初政治风云下的政党政论报刊	017
第一节	报刊为政党政治服务	017
第二节	梁启超主撰的《庸言》与《大中华》	021
第三节	“为失望于袁世凯而作”的《正谊》 杂志	027
第四节	强调朴实说理的《甲寅》月刊	032
第二章	《新青年》——新期刊开始的地方	041
第一节	启蒙话语和期刊流变中的《新青年》	041
第二节	铨锵主撰与创意主编	045
第三节	“独秀辈”与“我们自己的杂志”	054
第四节	同人的协力与动力	061
第五节	不以《新青年》为然的《学衡》杂志	069
第六节	白话恕不刊布的《甲寅》周刊	075

第三章	流传不绝的文人论政传统.....	080
	第一节 从《新青年》分离出来专谈政治的 《每周评论》	082
	第二节 谈政治且不忘怀思想文艺的《努力 周报》	091
	第三节 民族危机时刻肯说老实话的《独立 评论》	100
	第四节 被称作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刊物巅峰 的《观察》	111
第四章	期刊上的流派与流变	120
	第一节 期刊·流派·文学/文化史	120
	第二节 《语丝》与“语丝派”	124
	第三节 《现代评论》与“现代评论派”	132
	第四节 《论语》与“论语派”	136
	第五节 《新月》与“新月派”	141
	第六节 《现代》与“现代派”	146
第五章	新旧文学期刊的对峙与共存	152
	第一节 读者群迁移与《小说月报》的改革	154
	第二节 “异军苍头突起”的《创造》杂志	162
	第三节 以旧生新的《礼拜六》杂志	167
	第四节 新旧文学共同平台的《万象》杂志	174
第六章	左联期刊与右翼刊物	179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十年左联期刊的蓬勃发展 ...	179
	第二节 为“围剿”左翼而生的右翼刊物	187

第七章	旗帜鲜明的红色刊物	194
	第一节 党性文化基因的绵远流长	194
	第二节 建构“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 《向导》	202
	第三节 与《新华日报》同胞相生的《群众》 周刊	209
	第四节 高层读物属性的《解放》周刊	215
第八章	抗战时期刊物的播迁与文化适应	224
	第一节 战时状态下文化播迁的地方性学术 刊物《文史季刊》	225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文艺大旗—— 《抗战文艺》	232
	第三节 战时坚持“和读者一同成长”的 《七月》杂志	239
	第四节 战时宣扬唯意志论的《战国策》杂志 ...	244
	第五节 坚持抗战第一的《文摘》杂志	250
第九章	商业机构出版的各种类型杂志	258
	第一节 作为大型综合类期刊代表的《东方 杂志》	260
	第二节 作为教育类期刊代表的《中华教 育界》	271
	第三节 作为妇女类期刊代表的《妇女杂志》 ...	279
	第四节 作为儿童类期刊代表的《小朋友》 杂志	291
	第五节 作为青年学生类期刊代表的《中学生》 杂志	300

第十章	创意编刊与畅销杂志	307
	第一节 开创画报新时代的《良友》杂志.....	308
	第二节 尽显主编魅力的《生活》周刊.....	319
	第三节 通俗以自安的《读书生活》	326
	第四节 不做杂凑的《月报》文摘	332
	第五节 独特新闻视角的《新闻天地》	339
第十一章	科技期刊发展先盛后衰	346
	第一节 科学救国思想促进了科技期刊的 发展	346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技期刊发展 的影响	355
	第三节 日本入侵对科技期刊发展的严重 损害	364
第十二章	杂志的盛景流年与杂志公司	367
	第一节 各类型杂志的盛景流年	367
	第二节 “杂志年”与文摘、索引的涌现.....	375
	第三节 做尽杂志每一项业务的上海杂志 公司	383
后 记		392

导 言



第一节 民国期刊的社会性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开启了中国社会变局的连环模式：清末新政实际上接续了戊戌变法的变革框架，接着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帝制的最终覆灭；1912年民国共和政体建立不久又有袁世凯的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出现，基于政治不上轨道的历史反思，陈独秀等人开始从文化上寻找突破口，于是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方面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分化出了各种主义，并在长期的现实政治斗争舞台上标榜与竞逐；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它广州时期实行的党天下强宣传模式，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强劲的左翼文化为代表的各种思想的共存格局，说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从未享有独尊的地位；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民众动员工作由此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曾有所懈怠，而抗战胜利后接下来的国共内战，其实也是争取民心的宣传攻心战。这半个世纪里在中国大地上演出的连幕大戏，印证着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坚硬事实。作为媒介的期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系列时代剧中，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发展的高潮，有时是充当旗手、有时是派作推手、有时是领衔主角、有时是分饰配角，从来都身临其中，总与时代共起伏。且以统计数据说话，1912年、1919年、1927年、1945年，分别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四个时代节点，也恰是期刊创刊飙升幅度最大的几个时期。根据邓集田所做的各年度创刊中文期刊种数统计表，1912年创刊113种，是1911年创刊36种的3.14倍；

1920年创刊208种,是1918年创刊89种的2.34倍;1928年创刊709种,是1927年创刊475种的1.49倍;1946年创刊1420种,是1945年创刊679种的2.09倍。^①那些声名远扬的杂志,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甲寅》《新青年》《每周评论》《独立评论》《萌芽》《北斗》《生活》《抗战文艺》《解放》《观察》等,都在时代坐标中被指认为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意义,写进史册。作为连接社会的端口与平台的期刊,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潮流激荡中,其实一直遵循着与戊戌时期大致相同的“通”和“开”的社会功能,只是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期刊目标指向有所分别而已。



图导-1 《北斗》

具体说来,期刊社会性路径中的“通”与“开”,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社会作用力维度。那些为革命鼓吹、为主义宣导、为思想启蒙、为民众动员的期刊,更多的是执行垂直型的“通”的功能,试图通过从上到下的灌输与植入,建立一个弭平社会层级差别、与上层目标靠近的知识、观念和思想世界,并据之作为行动世界的指南。积极与主动,是这一类期刊的性格共相;导师和引领,是这一类期刊的心态共相;解放与改造,是这一类期刊的实践共相。上文所列举的各刊,均属于“通”类型的

的期刊范畴。因为敢想、敢说乃至敢干,而往往引发时代潮流涌动,并在某种外部历史机缘凑合之下,一时间形成了明星大刊示范性带动,外围卫星刊物呼应式跟进,纷纷然于多个层级、多个区域,迸发出同质化的期刊群落。上文所说的某些历史节点出现期刊数量骤增现象,或可从这一层面上予以解释。

^① 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在晚清民国年间创办的近两万五千种^①中文刊物中，像上述那样着意打通社会层级、刻有明显启蒙、宣导、动员意图的期刊，只是其中的部分而已。若从现代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些“通”类型的期刊，多属于政治和文化思想一类。只是因为这些期刊，往往背倚势力组织或高层精英，又挟时代声威，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一如洪水般急流直下，格外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期刊的社会性建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洪水型的倾泻，还有为数更多、范围更广的滴水型渗透，它们当中，有的只是为了获取市场利益，如各种商业出版机构办的刊物；有的只是为了搭建学术平台，如各种学术文化机构办的学术刊物；有的只是为了方便行业交流，如各种行业或协会办的刊物；有的只是联络学缘和地缘，如各种同学会同乡会刊物；还有一些针对特定的人群，如儿童刊物和妇女刊物等，它们都通过连续的出版与不断的发行，构建了或全国或地方，或行业或团体，或显性或隐性的水平状的多层级的社会“交流圈”，以媒介的方式，重塑和整合了社区社群的方方面面，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这里同样有名刊和大刊，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礼拜六》《良友画报》《新中华》《妇女杂志》《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它们也许不那么激荡潮流，像《礼拜六》《良友画报》这样的杂志，还公然声称只是娱乐大众，但我们知道，大众文化消费本身，其价值指向已迥别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样貌，再说，内嵌于刊物文本或副文本中的流行与时尚元素，亦为现代性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构成要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某些偏远地区如云南省的腾冲县，在某种微小行业如饲养蜜蜂的农场，在某种不定情形如抗战烽火的前沿，都曾办有期刊，说明这个古老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状态，已大大不同于过去的沉稳安闲，变革的因子开始逸出了中心的、上层的、都市的藩篱，而抵达社会的边缘、基层与城镇。这些四出活动、生生不息的“开”类型期刊，也许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不那么立竿见影，不那么声势浩大，却以其巨量存在和基层性特质，输送了另一种可贵的“绵柔”之力，与那些主动干预社会的“通”类型期刊一起，共同促

^① 邓集田根据《中文期刊大词典》统计，在1902—1949年间，共创刊中文期刊23277种，参见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成了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期刊大厦的建筑主体,正是这些芸芸众生般的“开”类型期刊构筑起来的。当然,这里把期刊作功能上的“通”与“开”的分类表述,仅是就其办刊旨趣的大体而言。其实,在实际的期刊运作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通”“开”二分对立,往往是二者的交叉与渗透,“开”中寓有启蒙与宣导,“通”中亦常作互动与沟通。

目下数字时代,多媒体多维呈现,一派活色生香,书报刊作为纸质文本,已被一同纳入平面媒介的范畴之中一体看待。事实上,就虚拟空间的人群集结和互动而言,期刊的社会文化生态,更接近数字媒体的一般作为,在数字时代之前,期刊中的《通信》《编读往来》《编后语》《编者按》《读者信箱》等名称不一的栏目,部分地执行着网络媒体中的“贴吧”“公众号”“讨论组”“论坛”等交流功能,一众读者或被吸引或被动员到刊物的平台上来,形成众声喧哗的话题与讨论,产生观点交锋甚至意气之争,通过一期连着一期的接龙形式,实现了比数字媒体略有时间差的交流与互动。民国时期的《生活》杂志,蔚为大咖,发行量雄踞民国期刊榜首,这与主编邹韬奋锐意经营《读者信箱》栏目,由此而团聚了超旺人气,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事实上,《生活》杂志的互动场景营造,并非邹韬奋编刊的独门秘籍,而是民国期刊实践的共相。在编者,或许是追求纸上世界的活泼热闹,借以吸附更多的社会注意力,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在作者和读者,则通过主动性的共同体参与,表达的是对期刊所代表的价值及理念的文化认同。从这个角度上说,期刊所构建的空间场域看似虚拟,其实内植了意义,它映现了现实世界,同时也在意义的层面上重构了现实世界。在民国五花八门的期刊周围,所聚拢的形形色色的读者,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与数字媒介中的“公众号”“论坛”中的粉丝一样,因身份角色、知识需求、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等等不一而足的区隔,显示了“分众”的社会性殊别,呈现着古语所云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性规律特征。同样,一刊之兴、一刊之亡、走马灯似更迭频频的近代期刊常态,亦应对着读者群落的分分合合,在成员间的聚散重组中,反映着近代社会习焉不察却无处不在的流动性面向,这正是一个社会步入转型的过程表现。中国近代期刊的成长,一方面固然是这种社会转型

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另一方面也为这种社会大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

如同网络媒体以网友低成本乃至零成本的代价，请君入“坛”入“吧”、入“组”入“号”一样，近代社会期刊的满园春色、遍地开花，亦是一般读者期刊支出的财务负担比书籍消费低廉而对期刊青睐有加的结果。尤其当某个时期国民经济不振之际，期刊更呈活跃之象，20世纪30年代中期“杂志年”的命名，便是对这一经济颓势背后文化消费偏转现象的概括。报纸购读当然亦很低廉，但报纸出版非有大财力不办，期刊则轻薄短小，成本无多，印刷不难，小机构、少人力即可应付，甚至三五同好集资办刊，其情形类似于现在的“众筹”模式。这样的刊物，民国时期称之为“同人刊物”，蔚为当时的一个重要期刊门类。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书报刊同为平面媒体，而期刊的办刊区域远为广泛，办刊的主体类别远为庞杂，从而表现出的社会性特征更显活泼、更接地气。时人胡适曾有结论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①他说的小册子新闻事业，就是期刊事业。

总而言之，近代期刊置身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以其自成一体的知识传授和思想传播系统，并通过其易变和快速反应机制，往往成为引发新一轮社会变革热情的直接诱因，甚至是行动实践上的力量支点。它所构筑的聚集场域，连接着个人与社会，发挥着公共空间的功能，在认同、交流与互动的社会性方面，堪称网络先锋。另外，近代期刊在地理空间、学科范围、行业领域及各社会团体中的广泛渗透，反映了晚清和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层的结构性更新，期刊的多元复杂面向，是被社会各色人等有意识作为文化交流媒介广泛应用的结果。借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结构表达，也许我们从民国期刊的繁杂生态出发，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期刊即社会。

^① 《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2页。

第二节 民国期刊的时代流变

从1815年第一本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诞生，到1915年《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办，正好100年时间。其间，报刊作为一种新媒体，见证了旧王朝的唱衰与崩塌，也经历了新政权初建时期的动荡与迷思。在参与新旧社会巨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报刊自身也获得了跨越发展。特别是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些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事件中，报刊所承载的知识思想传播、社会政治讨论、国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报刊的地位，从最初传教士宣教的工具，而跃进为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标志物。1923年，胡适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就明言，二十五年来，“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①无独有偶，吕思勉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一文中，也指出：“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凡风气将转迹时，必有一两种杂志为之唱率，而是时变动之方向，即唯此一两种杂志之马首是瞻。”^②

胡适和吕思勉所言指的时间段，大致重合在清末民初时期。胡、吕二人都是治学严谨、深具历史意识的学人，又亲身经历了这一时代的沧桑之变，对杂志与时代关系的观察，应该说，得出来的结论，有切己的体会。由此，也颇能说明期刊这种传播形式，经过戊戌变法以来几代知识分子的主导与参与，已逐步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同。当1913年的陈独秀亡命上海，找到他昔日的出版界老友汪孟邹，说想出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③陈独秀如此豪情满怀、信心满满，

① 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参见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② 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参见《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③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一方面固然是他个人一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杂志的传播功能有足够强大的预判。后来的事实，果被其言中。《新青年》的创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发端，“《新青年》的个性逐渐扩散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个性，它所刊登的文字，也就构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占据着中国思想界的中心位置，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影响”。^①就杂志自身的发展而言，《新青年》的成功，也是期刊史上的一个重要标杆。新文化运动期间，各地效仿《新青年》而创办的新杂志数量，多达四百余家。期刊作为改变和影响社会的媒介观念，在全国各地知识分子中，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再一次得到新一轮的大范围普及。

新文化运动对民国时期学术、文化、政治、社会各领域的影响，是广阔深远而又细致幽微的，这些都作用于后来期刊发展的方方面面。譬如说，伴随着各种学会、社团、职业团体的大量涌现，杂志出版便成为其最常规的一项工作内容，既为同人间的联络工具，也为交流学术心得、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伴随着现代学科的建制和大学的兴起，高校学报、学术性专业期刊与各种学生社团刊物，便成为高校师生课堂之外最重要的学术文化平台，对内可资师生间的交流研讨，对外可向社会发出声音。伴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关注，各种相应的专门性期刊纷纷创办，成为表达对这一人群关怀的重要凭借。伴随着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倡导，各种教育类杂志和行业性刊物，便成为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重要纽带。这些形形色色的刊物，有的发行量也许并不那么大，读者面也许也并不那么广，甚至有不少刊物因种种原因，旋起旋灭，但通过每一份杂志的共同合力，通过众多不知名读者的递相阅读，在传递现代观念、形成团体认同、形塑国民意识、构建公共场域、传播文化学术等方面，对时代变革所产生的尺寸累积之功，同样不可小视。

期刊与时代的紧密关联，亦是期刊发挥其媒介影响力的结果。作为一种新媒体的期刊，与传统形式的图书出版活动相比，它期期相接又期期相望的出版形式，无异于给阅读者植入了有标记的时间刻度，它所带来的强

^①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参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98页。

烈节奏感，以及寓含的对新资讯的及时性需求，是传统形式的图书难以望其项背的。正是期刊的“及时性”，要求其刊载的主要内容，须与“新”字相连接。各种新见闻、新知识、新思想、新观点、新学术、新思潮、新流行、新时尚，是读者对期刊的阅读期待，也是编者编辑期刊的首要出发点。从晚清到民国，制度的维新、政治的革命、思想的启蒙、主义的宣导、文化的嬗递、思潮的起伏、学术的阐扬，无不是期刊重点表达的方向和关注的兴奋点，呼应着时代的变化，暗含新与旧的较量。这样一条潜隐的主线，贯穿着整个近代期刊史。

与及时性紧密相关的，就是期刊的“当代性”特征。用吕思勉的话说，“皆针对当时之人发言；又其神情激越，足以动人之感情也”。^① 期刊上所探讨的是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触碰的是当下的焦点与热点，展现的是当前的趣味与流行，跟踪的是目下的思潮与进展，回应的是时人的困惑与期盼。如果说报刊的及时性，提供了时人“新学”的来源；那么，报刊所言指内容的当代性，便是时人通晓“时务”的管道。^② 对于各行各业的人来说，这种需要了解的“时务”，除了普泛意义上的时政、经济、文化等资讯而外，更包括专指意义上的、与个人日常生活世界更为密切相关的信息，诸如个人职业所在的行业动态，个人身份归属所在的地方、团体、业界、组织、机构状况，个人兴趣所在的社团、协会、学会的发展现状，个人学业所在的学科前沿进展等，不一而足。民国时期，随着现代社会转型在各领域的拓展与深入，期刊的分布，如水银泻地，遍及各行各业，囊括了各门各类，于是便有了民国时期期刊数量的洋洋大观。当期刊与各类人群的现实需要发生直接关系时，期刊就不难成为时代的推进器。

期刊上的文字集纳于众人，又需要持续且定期的出版，这样的出版模式，仅凭个人的力量，定然孤掌难鸣、独木难支，需要有稳定、制度化的组织作为其坚实后盾。虽说在民国时期，也有极个别能量大的人创办过个

① 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参见《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② 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参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1页。

人杂志，譬如自称为“周瘦鹃个人之小杂志”的《紫兰花片》月刊，内容均由周瘦鹃一人译、著，月出一册，居然维持达两年之久，^①但这毕竟是少之又少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期刊还是有赖于各种各样的组织作为其出版主体。这就是期刊的组织性特征。不管是先有组织后有期刊，还是为了编印期刊而专门建立组织，期刊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基础，是集体而非个人，因而期刊在社会动员和力量聚集上，更能产生个人力量难以企及的号召力和行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民国时期，无论是执政的政府，还是在野的政党，在运作政治时都钟情于期刊，将之作为舆论宣传和组织行动的有力工具。而在思想和文化界，期刊也是被团体用来表达共同主张和进行异己批评的利器，在不同思想和观点的纷争之间，期刊也往往成为流派形成的指认性标志，显现着时代的热点焦点转移和社会文化的变革变迁。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文化转型和变革中，启蒙与救亡，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时代主题。由《新青年》明确倡导的启蒙话语，即便在“五四落潮”以后，依然通过不同形式，广泛容身于各时期的各大小报刊中，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资源和文化立场表达。而对救亡的诉求，在近代民族国家危机的背景下，更是从未有一刻停歇过；即便在启蒙占据主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亦寓含着深刻的救亡意图。^②随着五四社会改造运动的逐渐深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探求中国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之道，而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品格，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带来的启迪，使得“五四落潮”的中国，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③于是有了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发展壮大，其背后的逻辑前提，则是爱国与救亡主题下，中国道路的何去何从选择。革命话语、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心词汇，在报章杂志上广为流行，令人耳熟能详。20世纪30年代以左翼刊物为主要阵地的左翼文化，

①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页。

②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这样表述道：“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抛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页。

③ 罗岗：《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